

在新世紀談《二十一世紀》

石之海



無論是預測性的或引導性的前瞻，都得從當下出發。馬克思指出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一定是在他所處的社會、文化及傳統境域中的。因此，在從事創造活動時，我們必須要掌握到自己所處的境域，才能從事有意義的創造。

把一個在二十世紀創辦的刊物取名為《二十一世紀》，我想創辦者的其中一個重要用意是讓大家知道這是一份前瞻性與展望性的刊物。

前瞻或展望可以包括兩個面相。它可以是對未來作預測性的工作，提出中國或甚至全人類的歷史將會朝甚麼方向邁進。這當然帶有一些決定論的色彩，它多多少少地蘊涵着一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歷史是有一些律則在那裏引導着它向前邁步。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哲學都帶有這種成分。前瞻的另一個面向，則是引導性的。這種取向的背後所蘊涵的哲學是，歷史是人類所創造的。世界上沒有普遍的律則規限着我們該怎麼走。我想黑格爾與馬克思的哲學也帶有這種成分。他們雖然都認為歷史有其終極目的，但是，如何邁向終極目的卻允許人有自由的選擇。

無論是預測性的或引導性的前瞻，都得從當下出發。馬克思指出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是在一定的歷史境域中從事這項工作的。這個境域就是他所處的社會、文化及傳統。他的自由永遠都是境域中的自由，它提供了他的出發點，當然也給予他限制。由於所有創造歷史的工作都離不開當下的境域，因此，在從事創造活動時，我們必須要掌握到自己所處的境域，才能從事有意義的創造。純粹只是腦筋裏想出來而與現實無關的理想，最多只可能是一種烏托邦吧了。我這裏所要強調的是，即使是前瞻性的東西，它也必須立足在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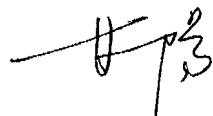
這就表示人必須要去做蘇格拉底提出的「了解自己」的工作。只有做到對自己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我們制訂出來的目標才具有意義。這十年來，《二十一世紀》有大量文章是這方面的，我想編者及作者也是基於前瞻必須從現實出發這種了解才討論這些問題吧。

前瞻既有引導性的一面，我想刊物的任務之一也是希望它能夠為塑造未來的歷史盡一份心力。雜誌的性質無論是討論的場所或是提倡及鼓吹一種思潮，它都希望能夠對創造歷史做出一些貢獻。中外歷史上不少刊物都曾經做到這點。例如早年的《新青年》、台灣的《自由中國》及《文星》、西方二次大戰時維也納學派及法蘭克福學派所辦的刊物。《二十一世紀》在這點上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常聽人說，二十一世紀是甚麼的世紀，我始終認為對歷史作預測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們雖然無法對未來作預測，但卻不可以不對它抱希望及盡自己的力量以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在此《二十一世紀》創刊十周年之際，一方面對它致以祝賀，另一方面也鼓勵它朝這個方向努力。

石元康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十年來的中國知識場域



在改革已經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以後，中國知識文化場域相對自主性的首要問題就在於，必須避免使知識文化場域完全服從於

改革的需要，防止知識文化場域成為單純為改革服務的工具，尤其必須避免以是否有利於改革作為衡量知識文化場域的根本甚至唯一標準和尺度。



很難相信，《二十一世紀》這份雜誌竟然已經創刊十年，令人想起王安憶不久前的一句話：「似乎是，沒有甚麼過渡的，一下子來到了十年後。」

回想起來，陳方正兄等當時創辦這個雜誌，大概是希望在「六四」後把80年代大陸「文化熱」的香火在香港接下來——現在仍然印在雜誌第一頁上的「為了中國的文